



台中大同國小捐贈的鼬獾標本



1969年採集的黃鼬標本



民眾捐贈的狸貓標本

文・圖／陳彥君

壯觀的哺乳類動物骨骼，及栩栩如生的鳥獸爬蟲等標本，常是博物館裡最引人注目的經典項目，但是熟悉剝製標本的人都知道，這一類動物標本非常不耐新，一旦製成，也就是它劣化的開始，很有可能才沒幾年光景，就顯得老舊。動物標本的宿命確是如此，這真的意味著它們「年老色衰」就沒有價值了嗎？

其實不然！在本館動物學組的標本庫裡，就至少有兩個例子，證明老標本也有不凡價值，只要有人能發現或是運用它們的價值！1995年本館接收了一批1960年代採自台灣各地的小型哺乳類動物標本，總數約500件，多為浸泡福馬林後乾燥者，其中一件採於1969年合歡山的褪了色的小型黃鼠狼，兩年後被東海大學生物系林良恭教授證實，原來是當時台灣從未記載的高山小黃鼠狼。而一具來自1990年屏東後壁湖漁港，也是本館庫房裡最為陳舊的鯨魚骨骼，12年後讓日本國立自然博物館的鯨豚專家為它連續來訪3次，並驚為新種「角島鯨」。這些實例讓我們了解到，標本的價值並非僅止於服務一般大眾觀賞和稱奇而已。在研究者的眼裡，標本是人類理解自然界的重要媒介，老標本正代表了它存在的年代及地點，就像是古代文物一般，是無可取代的重要物證。

台灣在日據時代曾有一段動物標本製作蒐集的黃金時期。由於日本的自然科學紮根甚早，1926～1989年在位的日皇裕仁還是位業餘生物分類學家，他在皇宮成立生物研究所，典藏豐富的動植物標本，更著作了動物圖譜、植物志等17本專書，影響所及，分類學研究在日本甚至成為一項高尚的興趣，成為很多人的業餘精神寄託。日據時代台灣至少有兩個重要博物館蒐藏動物標本，一是台北的台灣總督府博物館，即今日國立台灣博物館；一是台南（教育）博物館，燬於二次大戰，咸信後者為台灣物種研究標本重地。而當時的重點大學、中學、小學及林務單位等，也與日本內地一樣，都有為數不少的動物標本作為研究材料或教學教材，收集態度積極，標本來源主

要是台灣本地的野生動物，還有動物園內搜羅的各國珍禽異獸。日據時代的台北圓山動物園其規模已是東亞屈指可數者，飼養後死亡的動物也沒有浪費，轉給各機關製作、共同累積成可觀的標本。

光復初期，部分政府機關承接了日據時代的財產項目，繼續保管著老標本，例如台灣大學生命科學系的標本館，以及國立台灣博物館的標本庫，其日據時期製作的各種動物標本大都還保存至今。但因戰亂紛擾的關係，以及新興的分子生物學取代傳統分類學強勢發展，動物標本受重視程度減少了很多。此後，除了在大學動物學相關系所稍有延續外，動物標本——特別是脊椎動物剝製標本收藏逐漸沒落，並轉變為小眾的個人愛好者的私人收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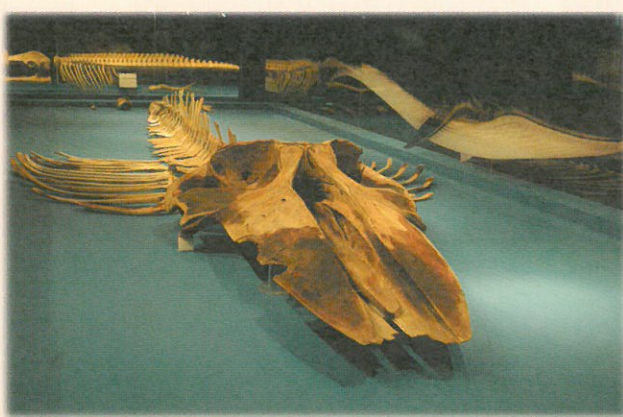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台灣初站上國際貿易舞台的60年代，由於當時國內沒有吸引人的自然史博物館可參觀，民眾沒有親見珍禽異獸標本的機會，曾有那麼一段時期，在海外工作返鄉的遊子，流行將罕見的異國的鳥、獸皮或標本帶回台灣轉售、收藏或當作餽禮，較常見的包括穿山甲、玳瑁、海龜、鱷魚、企鵝、鹿頭、水牛頭、老虎、金錢豹、雲豹以及來自印尼的天堂鳥等。常見到標本的場合轉為中藥舖、藝品店、山產店、動物產品買賣商店及觀光休閒場所，而台灣本土動物標本很多情況成為服務外銷，為國外私人或標本館所收藏。1989年台灣頒布了野生動物保育法，打擊了動物標本的源頭——山產店，以及對動物進出口管制的緊縮，動物標本在台灣的流通或製作，無論機關學校或民間，一夕間受到了明顯的限制。直到近十年來，因為生物遺傳多樣性研究的興起，以及博物館概念受到社會的重視，台灣脊椎動物標本的成長才有了新契機。

持平來說，動物剝製標本在台灣並沒有像先進國家那樣受到熱愛與重視，除了自然史研究不發

達之外，原因還有很多。跟高緯度國家相較，亞熱帶的台灣在標本保存上的確不易，標本多需要特別給予適當環境與照料，否則極易因高溫與高溼而產生不利的變化，例如發生變形與脆裂。更且，很多人並不知道標本放在光線充足的地方更糟，因光線是色素的超級殺手，將引發褪色反應，動物毛皮上本來具有的鮮豔顏色或斑紋，沒幾年就逐漸發黃黯淡，也易沾染落塵而變色，不再吸引人。骨骼標本除非用罩子防塵防溼，否則也很快發黃發黑；而動物標本還特別容易遭蟲蛀與發霉，凡滋生蟲黴的標本很快就顯得髒舊不堪，這樣的藏品令收藏者不知如何是好，最後常是無奈的清而除之。

本館動物學組鳥獸學門成立20年來，因重視自然歷史而相當看重老標本，並陸續地從一些歷史悠久的學校、機關、老字號標本商號或私人民眾等處，獲得了一些舊動物標本的捐贈，部分仍有確實年代地點可徵信，相當令人振奮，因此推測台灣各地可能仍有為數不少的老標本——倘若至今還沒有被清除的話。

包括像台中市的大同國小、東海大學、嘉義市立文化中心、台東縣鹿野鄉瑞豐國小，以及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等單位，都保



1990年來自後壁鯨骨骸

管了老標本多年，但因為留在單位裡已無用途，或是標本看來非常陳舊甚至破損，不知從何維護，陳列起來又令人望而生畏，最終決定放棄。關鍵的是，當時主其事者明智地選擇聯絡標本保存單位，與本館取得了聯繫，讓這些老標本免除直接變成垃圾

的命運，這些單位在移轉這些標本到本館的同時，也負責地移轉了保管標本的歷史責任。除了機關學校之外，更有一般民眾主動聯絡本館，表示家中有長輩留下的收藏，包括天堂鳥、鱷魚、印尼虎等標本，或是狐狸皮、豹皮等動物皮張，

願意捐贈給博物館保存。曾有民眾捐贈了一件類似果子狸的標本給本館自然學友之家，作為教育展覽之用，研究人員發現該件標本為白鼻心的遠親種類——狸貓（Palm civet），是台灣難得見到的異國標本，因此被正式移入庫房典藏，作為日後相關科系學生實習的教材。

對於舊標本的捐贈，即使標本狀況不佳，本館大都是歡迎的，雖然部分可能已無展示的價值，但作為自然物證的研究或教育價值仍是存在的，經過專家的篩定及保存，在博物館中也許更有機會碰上能夠善用的伯樂。

近幾年有機會察訪標本的關係，訪問了上海、福州、杭州等地的自然博物館或大學標本館，以及新加坡、日本的自然博物館。結果卻無意間得到一個令人驚訝的結論，那就是華人世界對動物標本普遍不夠重視。這包括號稱西化最深的新加坡，經濟起飛的同時居然將西方人遺留下來大批的動物標本「請」出了剛更新的國立博物館，讓標本管理員自行尋覓投靠處所，後來總算由新加坡大學出面收容了這批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動物標本，並僅以很有限的經費及空間保存。而中國東南沿海的動物標本收藏，過去是以上海為首，今日上海的經濟發展可謂一日千里，新博物館的建築宏偉無比，大學也獲得重點補助，但是動物標本收藏或維護部分則停滯不前，迄今未受到「政策」的青睞，許多老標本仍處在舊建築當中，沒有獲得整理的服務。在福州、杭州等地，也都有嶄新的博物館建築，卻對比著老舊無比的標本庫房設施，與凋零的標本研究管理人員，不禁令人感嘆！21世紀了，華人的自然史基礎科學不知要紮根在何處？

一個國家如果文化執意停留在千年前，她的科技又能進步到哪裡呢？科學其實仍無法脫離其文化環境獨自進步，我們並不能在失去基礎的發射台上談論甚麼事情要起飛。老標本，你在哪裡？